

Where 东方主战场

Who 抗战中的企业家

台儿庄大捷:70 余年声未销

■ 本报记者 王莹

为期一个月的“抗战在徐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档案图片展”，自8月15日开展以来，每天吸引着大量观众到此参观，图片展再现了徐州这座英雄之城浴血抗日的历史画卷。尤其是永载史册的“徐州会战”，让那段血与火的抗战历史至今激荡在历史的天空，让当年台儿庄大捷捷报声依然带给我们的振奋之情。

战略要地必争

“会战之所以发生在徐州，是因为军事与地理的双重关系。”抗战史学者余斌说，徐州是中原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有由黄海进入中原的通道，是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的交汇处，后来的淮海战役实际上就是围绕徐州打的。

徐州地处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叉点，扼苏、鲁、豫、皖四省之要冲，战略位置至为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全国抗战进行了半年之后，随着日军越过黄河，济南、泰安失守，中日军队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决战的形势已经出现。

占领徐州，日军全线贯通津浦线，就可以利用铁路运输和机械化优势，轻易进行南北兵力和物资调运，可以从整个铁道线任意选择薄弱环节进行推进，大大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通过和陇海线的配合利用，更容易向平汉线推进，进攻郑州和武汉地区，以及沉重打击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和抵抗能力。徐州会战由此爆发。

徐州会战实际上由两大阶段构成，一是以台儿庄战役为核心的鲁南会战，这一阶段中方取得了轰动中外的重大胜利；二是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以徐州为中心部署的徐州会战，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这一阶段中方被迫突围。

台儿庄大捷，是徐州会战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在修葺一新的台儿庄古城旅游景区，仍然保留着一栋残破的灰砖小楼，小楼的外墙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弹孔，那是血战台儿庄最直观的证明。

台儿庄战役主要是由滕县战斗、临沂战斗和台儿庄战斗这三场战斗组成的。滕县战斗王铭章率领着川军3000人，当时装备也

是劣势，而且兵力比日军少，王铭章坚守滕县三天四夜，给敌人以重创，王铭章的川军大部分牺牲，包括他自己壮烈殉国，但是他为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保证了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战役的总体兵力是中国军队29万，日军5万，在李宗仁的指挥之下，击溃了日军第5师团、第10师团两个精锐的师团，歼灭了日军一万六千多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而且关键是严重挫伤日军的气焰。

徐州会战虽然最后失利，但持续四个月的持久战吸引敌人十数万兵力于津浦线，为武汉备战、中国国力重心西移争取了时间，为尔后全国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样的一个基础背后，伴随的是中国军队的巨大损失。

开辟新战场

波澜壮阔的徐州抗战史这次浓缩在500余张图片和近200件档案史料中。这些铁定的史料，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未来的昭示。如今，走出战争阴霾的徐州，为建设“强富美高”的新徐州，连片开辟经济发展的新战场。

徐州经济开发区是徐州市重点建设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和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按照建设“全市经济发展第一增长极”和“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总体要求，以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建项目的“三重一大”建设为引领，大力引进和培育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重大产业项目，加快空间集聚、产业集群、技术集约，提升发展质效。全区现有各类企业3176家，其中外资企业151家，世界500强企业13家，千亿元企业1家，百亿元企业3家，亿元以上企业92家。先进制造业能级提升，高端工程机械产业已集聚了全球前五强的美国卡特彼勒、德国利勃海尔和蒂森克虏伯、徐工集团等一批知名品牌企业，已形成大型矿用机械、大型挖掘机、起重机、混凝土机械等12大类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形成了从主机到关键零部件较为完整的高端工程机械产业链。太阳能光伏产业拥有多晶硅产能世界第一、技术品质一流、节能环保水平领先的中能硅业；全球单体规模最大、光电转换率最高的铸锭切片专业工厂——协鑫硅材料；省内最大的光伏电站——协鑫集团20兆瓦光伏电站；正在建设白炭黑、电池及组件等重大项目，形成了从多晶硅到光伏电站完整的先进光

伏产业链。新能源车辆、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制药及医疗器械、新型照明产业研发制造、新型家电及通信等五个新兴产业已集聚了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和龙头项目，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成为江苏省专用车辆和工业机器人产业基地。

红色“三次创业”

在全面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徐州以开发区为主体，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三次创业”，并在机制体制上，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产城融合、提升科技创新。

“放宽公司制企业注册资本、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等门槛限制，降低登记准入门槛，有效激发了‘双创’活力。”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管局行政许可服务科负责人介绍，未来的园区，将更加注重技术溢出、人才溢出，推进协同创新，着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据介绍，上半年以来，开发区新办工商企业456个，同比增长32.2%，完成全年计划的94.21%；实现注册资本26.6亿元，同比增长88.5%，完成全年计划的73.28%。为更好地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降低企业登记准入门槛，简化手续、减少环节、最大限度缩短审批办理期限，目前80%以上的业务“即来即办、当天办结”。下一步，还将推广“三证合一”办证点。

值得注意的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推行“目录”和“清单”管理，稳妥推进“先照后证”改革，依法将143项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只保留前置审批34项，努力降低登记风险。同时也在研究探索“先照后证”信息告知制度和提醒制度，认真做好“先照后证”改革后的衔接工作。对大企业大集团及“三重一大”项目，则提供“一站式”保姆式服务，个别企业还实行“一对一”包挂。

在加快产城融合方面，开发区将突出抓好高铁生态商务区二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电子商务、生态研发、文化创意等功能平台建设，持续加大“2.5产业”培育力度，引进培育电子商务、现代金融以及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研发中心等高端服务业企业，力争用5—8年时间将高铁生态商务区建成产城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古耕虞：“猪鬃大王”撑起“抗战命脉”

■ 晋珀 郭婕

1905年生于四川重庆的古耕虞，中学就读于教会办的广益中学。1919年在上海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学习英语。1923年至1924年，古耕虞遵父命，赴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今南通大学）纺织专科学校学习。

“少掌柜”创品牌

1925年，21岁的古耕虞学成归来，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古槐青创办的企业“古青记”。当上了少掌柜后，仅两年便“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仅8年便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使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

猪鬃是指猪颈部和背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刚韧富有弹性，不易变形，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是工业和军需刷的主要原料。猪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油漆军舰、飞机及各种军车，清刷大炮的炮筒等，都离不开它。

古耕虞将猪鬃产品定名为“虎”牌，意欲一跃而起，吼啸世界。以前，四川的猪鬃等皮毛出口是由在上海的英国中间商代理，而美国是中国猪鬃最大的需求国。古耕虞早就想摆脱英商，直接把猪鬃出口美国。1927年左右，古耕虞凭借非凡的智慧和外交能力，与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达成了秘密协议：一部分猪鬃交给在上海的英商，一大部分直接出口到美国。古耕虞通过这个途径垄断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猪鬃的生意，成为当时重庆最大的“山货大亨”。

创外汇支持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后方的民族资本发展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僚资本更以抗战为名，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特别是猪鬃，因为是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法币，相差达10多倍之巨。古耕虞的民营企业受到了残酷的盘剥，因此，他对国民党官僚企业的统购统销有些抵制。

此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

周恩来一见到古耕虞，就亲切地询问“古青记”的经营状况。古耕虞也不隐瞒，一一道来，据实以告。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官方垄断和掠夺，言谈中极为愤慨。周恩来沉思着认真地倾听，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战时的统购统销”其实质就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的行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支持中国长期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但国民党种种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要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同时，周恩来还开导古耕虞说，“为了支援抗战，猪鬃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周恩来说的那些话，在古耕虞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深明大义作出牺牲，他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统购统销。此时重庆市场上猪鬃的价格已由每担900元（人民币）猛跌到380元，古耕虞果断地将所有猪鬃全部收购下来，并全部出口，成为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1946年至1948年间，汉口的80%猪鬃，天津的50%猪鬃，重庆的50%猪鬃均被古耕虞任总经理的四川畜产公司收购，美国进口的猪鬃有70%是四川畜产公司的，古耕虞成了中国的猪鬃大王。

参与新中国建设

1948年，在中共的支持、帮助下，古耕虞赴香港设立四川畜产公司，成为我解放区发展外贸的重要窗口。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古耕虞先付钱、后来货。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还没有开展起来，国内需要的进口物资没有外汇支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封锁了中国海岸，实行禁运。当时古耕虞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区的猪鬃输向美国和西欧，一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政府在国外购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邀请古耕虞列席新政协，同时请他参加全国猪鬃会议。1949年10月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古耕虞，并希望古耕虞任中国猪鬃公司经理，全权负责。古耕虞接受了这个任务，并表示把四川畜产公司交给国家经营。

“文革”中，古耕虞受到了长期不公正的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古耕虞如沐春风，老骥伏枥。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把他与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邀请到家里谈话，主要是国际贸易问题、发挥工商业者作用问题。

之后，古耕虞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特邀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特邀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及第五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届常务委员等多个政界要职。

（作者单位：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



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46年徐州大会战战记功令

When 八年抗战: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十

1937 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胜出

结合之前的土地革命和之后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政策是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条件下，共产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唯一正确政策。减租减息政策被称为“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的政策，减租减息的提出其实早于全面抗战的开始。1937年5月，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将土地革命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转变。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边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法令的要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

晋察冀边区的创始人聂荣臻将这一政策称为“挤牛奶”式策略。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

但当时，在各个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情况却参差不齐。1940年初，太行区党委发现晋察冀的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是当时各边区的样板。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在总结了抗战以来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经验之后，第一次正式颁布了详尽统一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完全形成”。

由此，减租减息开始在各解放区普遍实行。直到1946年年终，减租减息政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